

CUR

第1辑

主编 张鸿雁 李强

China Urban Review 中国城市评论

蔡 昉 高文书：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及其对策

李强等：北京市什刹海地区旧城保护与改造的研究

赵永佳 吕大乐：两极化的全球化城市——以当代香港为案例

张鸿雁：“合理性危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章仁彪：中国城市化战略与和谐社会构建

田中重好：日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的特殊性质



南京大学出版社

CUR

第1辑

China Urban Review

中国城市评论

主编 张鸿雁 李强

总监制 杨雷

主办单位：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垠坤代理机构

罗素城市策划研究院

CUR

第1辑

China Urban Review

中国城市评论

责任编辑 施敏

责任校对 陆蕊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评论. 1/张鸿雁, 李强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305-04584-5

I. 中... II. ①张...②李... III. 城市化—中国—文集 IV. F29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2633号

《中国城市评论》所刊图片、文字、图案等作品的著作权依法受保护。任何未经授权抄袭、复制、使用上述作品均属侵权。一经发现, 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中国城市评论》感谢所有提供图片资料的个人和机构, 并尽力标明。如有遗漏, 敬希谅解。

本书图片、文字凡涉及著作权的, 请著作权人与025-84699886联系。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ppt.js.cn

印刷 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350千

版次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5-04584-5/C · 146

定价 40.00元

Chief Editors	主 编 张鸿雁 李 强
Subeditors	副主编 田中重好 章仁彪 王恩重
Chief Supervisor	总监制 杨 雷
Editing Committee	编委会 (第1辑) (以音序排名) 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映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顾建光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李 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吕大乐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石良平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田中重好 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学研究科教授 日本城市社会学专业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恩重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副主编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 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王祥荣 复旦大学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研究室主任 张鸿雁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章仁彪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邹农俭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周 琦 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Head of Editors' Office	编辑部主任 周蜀秦
Executive Editors	执行编辑 唐晓岚 胡小武 周蜀秦
Invited Editors	特约编辑 王世军(同济大学) 王郁(上海交通大学)
Editors	编 辑 陈丹沛 季彩萍 刘芸 谢静
Cover Designer	封面设计 鲍海玲
Page Designer	版式设计 鲍海玲 高炜
Invited Photographer	特约摄影 高林胜
Add	地址 南京市中山南路89号江苏文化大厦24楼
P.C.	邮编 210005
Tel	电话 025-84699886
Fax	传真 025-84699406
Email	电子邮件 chinaur@sina.com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Letter for Articles

察的前瞻性，采取匿名审稿制。

◎本论辑研究栏目拟定
(5)城市品牌与城市形象；(6)
城市格调；(11)个案城市解读。

◎欢迎学界朋友一起关

(1) 欢迎城市学、地理问题探讨、时事点评、研究

(2) 来稿不仅限于上述

(3) 每篇稿件一般不起

(4) 本刊以学术中立性

(5) 来稿请写明作者姓名

(6) 来稿请提交250字

(7) 注释、参考文献

(学术著作) 作者: 书名:

(学术期刊) 作者: 题名:

(学位论文) 作者: 题名:

Email: chinaur@sina.com / Tel: 025-84699886 / Fax: 025-84699406

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89号文化大厦24楼《中国城市评论》编辑部 刘芸 210005
 南京大学逸夫管理科学楼411室《中国城市评论》编辑部 周蜀秦 210093

我们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

当中国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姿态展开，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正朝着工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走近，当我们阅读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时候，我正感受着这一社会变迁——一个社会整体进化如海潮一样涌来。

蓦然回首，人类城市的文明已经走过了8千年左右的历史，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人类自己创造的城市，300万年的人类史，95%以上的时间里是在没有城市的条件下度过的，人类为什么要走进城市？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样态？还是人类原始本能的再现？当工业化伴随城市化创造了规模性生产，并衍生出新的生产组织型式时，城市成为人类社会的加速器；当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结构性增长，城市则成为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当现代技术创造了汽车生活、网络社区、虚拟社区，发达的城市正在走进后工业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孕育着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社会——新的群体、新的职业、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观念成为现代城市社会变迁成果，城市社会的人正在异质性强，世俗社会的加深，创造着个性化生活方式。

城市从产生那天起，城乡之间便筑起了一道鸿沟，中国古代有“都鄙”、“国野”之分，城乡差别成为人类社会存留至今的社会场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路途成为历史上最长久的人口流动场域和最伟大的社会舞台。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乡差别史，更是一部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历史，时至今日，也是人类社会最壮观、最悲怆、最富情感的历史展示之一。

城市是文化的摇篮，是人类文化的容器，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创新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创造人类文化的奇迹，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雅典创造了最为多彩的城市诗篇，庞贝城告诉我们罗马人自己构建了值得传承的城市生活方式，那凝固的城市街区与生活样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整体雕塑，是人类城市文明长河中的一颗明珠。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千百座城市演绎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历史画卷，创造出华夏文明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那一个个历史片断，一幕幕历史场景，似繁星点点，给人类文化的长河以伟大、以深邃、以隽永……中华两千多年的城市文明，秉承这一伟大的财富，成为中华民族城市文明永恒的记忆和情愫。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畅想法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传统农业社会与传统农民的消亡，为现代城市社会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式。没有农民的城市社会已经在中国发生，世界大都市的发展，六大都市带的形成，城市全球化给我们以新的视点，城市正在出现结构性变迁，再城市化正改变着我们以往城市的认识观，新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认识城市的新的工具，21世纪中国城市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思想观念和管理、认识方法上的挑战。一是城市社会来临前的城市化及再城市化决策思想的大挑战。面对未来十几年5~6亿农业人口进城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城市发展战略决策方式要改革，特别是应该提出对应性的政策和主张，至少是在消除城市差异的意义上进行城乡“三维立体整合规划”，构建一个未来以城市农业、城镇农业、

“城市人农业”为主的城市市民社会。二是城市生长机理、特质认知及方法论的大挑战。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结晶，其发展过程是有其必然性增长机理的。城市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发展，既有中国城市特有的历史特点，又有世界上与其他城市一样的成长的规律和功能：(1)城市的“开放性的适应性功能”；(2)“城市的财富积累功能”；(3)城市作为文化容器的功能；(4)城市创新功能；(5)“城市的世俗化效应与功能”；(6)“城市的循环累积因果功能”；(7)“城市的结构性无限扩张功能”；(8)“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集中表现形式功能”；(9)“城市文化资本的功能”；(10)城市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整合功能及新出现的“新都市主义”、“后都市主义”、“城市空间价值性与商品性”等都是在新时代发展下表现的城市基本特质和发展事态，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城市这种功能、特质和生长机理，才能够充分理解城市，并驾驭城市的规律，成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创造者。三是中国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大挑战。当代中国的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价值存在模式和管理思想，城市既是行政管理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科层体”，以行政管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现在的城市发展必然改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向“城市客户型管理模式”转型，从城市行政控制型的城市经营向“城市行销型”转变。四是城市规划理念及规划决策方式的挑战。城市规划本身不应该仅仅是物化的规划，更重要的是人的规划，如伦敦在其规划中强调让“让人们充满选择机会”，这是一个市民社会意义上的规划理念。五是城市管理人才需求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城市管理学科的专门培养人才，而当代中国是663座城市，未来15年可能要达到1500座城市，城市发展中的一切变化，都需要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与之相适应。需要新的城市知识武装城市管理者，这也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认知。

面对中国城市化的新时期，我们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十大新主张：(1)我们提倡创造城市特色竞争力新核心力主张；(2)我们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新生态城市主张；(3)我们提倡城市细节的新城市美学文化主张；(4)我们提倡城市人际和谐的新社区生活主张；(5)我们提倡诚信为本的新城市行为文化主张；(6)我们提倡区域合作竞争的新区域战略主张；(7)我们提倡城市文化生态道德的新城市消费主义主张；(8)我们提倡发展循环城市社会的新循环城市社会主张；(9)我们提倡共享资源的全球化城市主张；(10)我们提倡充分就业的新城市服务理念主张。

创造中国自己的城市学理论、体系和模式，已经是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要求！

正如美国《商业周刊》的一句名言：“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成功。”

孙为臣

2005年11月9日于金陵名人寓所慎独斋

主办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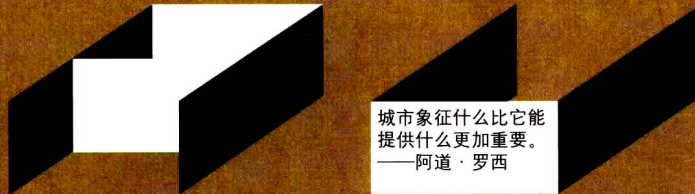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垠坤代理机构
罗素城市策划研究院

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
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复旦大学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城市社会学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系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学研究科
日本城市社会学专业学术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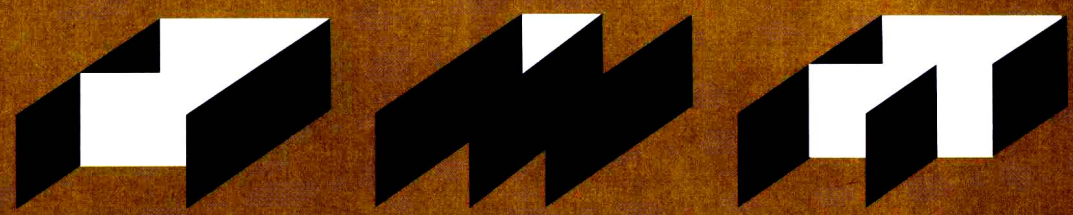
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
是为了生活更好。
——亚里士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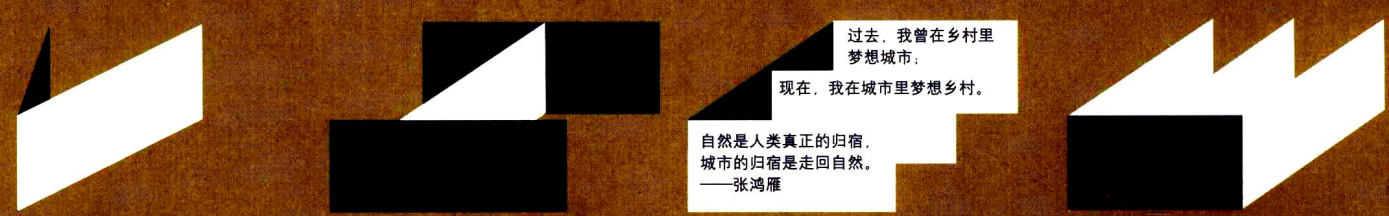
城市象征什么比它能
提供什么更加重要。
——阿道·罗西



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
由城市产生的……
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
代史。国家、政府。
政治、宗教……
无不是从人类生存这一基本形
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
其上的。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把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内
容，无论什么样的内容，
不要破坏。
而尽量设法使之能够融入城市
整体中去，使之成为这个城市
的有机内涵之一。
——舒玛什《文脉主义：
都市的理想和解体》



过去，我曾在乡村里
梦想城市；
现在，我在城市里梦想乡村。

自然是人类真正的归宿，
城市的归宿是走向自然。
——张鸿雁

CUR

第1辑

China Urban Review

中国城市评论

目录

001	城市化模式选择
004	蔡昉 高文书：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及其对策
010	章仁彪：中国城市化战略与和谐社会构建
	邹农俭：城市化辨
015	城市问题批判
020	宁越敏：论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问题
026	赵永佳 吕大乐：两极化的全球化城市——以当代香港为案例（上）
032	吴忠民：应当完整地理解社会公正
041	陈映芳：城市贫困的新问题
	金一虹：消减城市贫困的社区机制探讨
051	城市社会与城市生活方式
060	张鸿雁：“合理性危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063	李路路 刘精明：城市阶层结构与居住模式
069	李伟民：都市生活的变迁
080	叶裕民：北京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意向调查研究
085	王世军：汽车社会与城市发展
	任雪飞：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1910~1970年
095	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经济
102	鲍宗豪：城市文化与民族文化精神
108	王桂新 戴贤晖：上海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靖学青：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测度及评价
113	和谐城市
124	李强等：北京市什刹海地区旧城保护与改造的研究（清华大学课题组）
132	王祥荣等：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战略规划——以上海为例
137	李琳 林荫超：建筑与音乐
140	周琦：民居·原型·城市
	王郁：城市管理的挑战与创新
147	国际城市
150	石良平：从伦敦成功经验中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
	田中重好：日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的特殊性质

CUR

第1辑

China Urban Review

中国城市评论

Contents

001	Urbanization Modes Fang Cai / Wenshu Gao: The Economic Outcome and Countermeasure to the Restriction Policy on Labor Forces Flow
004	Renbiao Zhang: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010	Nongjian Zou: On Urbanization Issues
015	Criticism on Urban Problems Yuejin Ning: Comments o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ocial-Economy Co-development
020	Stephen Chiu / Tai-lok Lui : The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 - About Modern Hong Kong
026	Zhongmin Wu: To Understand Social Equali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032	Yingfang Chen: New Problems about Urban Poverty
041	Yihong Jin: Probing into Community Function in Eliminating Urban Poverty
051	Urban Society and Life Style Hongyan Zhang: Rationality Crisis :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060	Lulu Li / Jingming Liu: City Class Structure and Residential Patterns
063	Weimin Li: The Change of Urban Life Style
069	Yumin Ye: Research on the Intent to Improve Living Quality of the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City
080	Shijun Wang: Auto- Society and City Development
085	Xuefei Ren: Theories of Chicago School of Urban Sociology During 1910 ~ 1970
095	Urban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ghao Bao: Urban Civilization and Folk Culture Spirit
102	Guixin Wang / Xianhui Dai: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cale and Economy Growth of Shanghai
108	Xueqing Jing: Measurement and Estimation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mong the Yangtze Delta Cities
113	Harmonious Cities Qiang Li etc.: A Report on Shisha Hai Area Prot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Tsinghua University Project Team)
124	Xiangrong Wang etc.: Strategic Pla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ity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Taking Shanghai as the Case
132	Lin Li/ Yinchao Lin: Architecture and Music
137	Qi Zhou: Native Building, Original Mode and City
140	Yu Wang: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for City Administration
147	International Cities Liangping Shi: On the Successful Megapolis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London's Experience
150	Tanaka :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City Plan and Urban Society of Japan

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及其对策

蔡 昉 高文书/文

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状况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由于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隔离了城市和乡村，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和农业生产上。据估计，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政策的推行，阻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体制性障碍逐渐得以减少或消除，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流动，尤其是向城市流动。

近年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大幅增加(表1)。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居住地与出生地不一致的人口有1.2亿，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并居住半年以上的有近6000万，但按照整体就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这种转移速度仍然不够。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4.21%，比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27个百分点，相当于6679万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将进入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该收入组国家的农村人口比重平均为23%左右，我国要将农村人口比重降到这一水平，即使在人口总数不增加的情况下，仍需要转移出5亿以上的农村人口。如何实现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城市中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表1 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情况

	全部外出劳动力		其中：出省劳动力	
	总数 (万人)	比上年增长 (%)	总数 (万人)	比上年增长 (%)
1999	5203	5.43	2115	—
2000	6134	17.89	2824	33.25
2001	7849	27.96	3681	30.35
2002	8399	7.01	3897	5.87
2003	9831	17.05	4031	3.44

资料来源：张红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问题研究报告》，载《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论文》，2001；刘建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载《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情况分析》

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

当前，我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1. 户籍制度仍然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现行的户籍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造成他们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导致异常甚至失范。对外地人充满歧视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妨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有一定进展。例如，小城镇实行的“最低条件，全面放开”改革，一些中等规模和大城市实行的“取消限额，条件准入”改革，以及特大城市实行的“筑高门槛，开大城门”等，都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局限于户籍身份的获得，却没有与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特别是在特大城市，筑高门槛的做法，实际上还阻碍了那些寻求城市就业机会的普通外来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劳动力真正进入并融入城市的要求来说，仍然助益不大。

2.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城市管理部门往往还采取关闭或抑制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性就业歧视，以及其他增大农民工迁移成本的政策措施，来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城市公共服务也把外来劳动力排斥在外，使得他们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必要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服务，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3. 农村土地难以流转，制约着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权主体并不明确。农村人口只享有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处置权不明确。虽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转让，但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加之政府和集体对农户的双重干预，使土地产权的流转异常艰难。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在无法有偿转让或转包土地的情况下，一方面粗放经营土地乃至撂荒土地，另一方面怕丧失土地的基本生存保障权，而不敢轻易选择落户城市。

三、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

1. 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 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 从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流动不畅, 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造成边际生产力低下, 资源配置被严重扭曲。这还导致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阻, 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投资结构的改善、外资的引进和对外贸易的扩大等。因此, 一旦劳动力流动起来, 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必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 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 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①可见, 如果劳动力流动更充分,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更高。

2. 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 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农业产值在GDP中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 而农业劳动力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2003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GDP增加值只有4677元, 而二、三产业则分别为3.8万元和1.8万元。在这种劳动生产率对比之下, 农民增收成为无源之水。据报道, 1997~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 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量的1/5, 增长速度不及城镇居民的一半; 而农民收入增加的部分, 主要来自外出务工收入。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2:1, 大大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的隐性补贴, 实际差距约为5:1~6:1。^②

因此, 缩小城乡差距、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创造就业机会,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通过城乡劳动力流动, 从数量上改变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关系,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业摆脱弱势产业的地位。地区差距归根结底是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 一旦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了城市和农村、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地区差距也可以迎刃而解。

3. 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 将继续延缓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主题。国际经验表明,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然而, 执行多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没有能力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进程大大滞后。目前,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不仅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是最低的, 也低于中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化滞后和城市化速度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畅通。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放宽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资料, 如果没有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 农村人口比例会维持在66%, 而通过劳动力流出, 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至61%, 也就是说, 近年来劳动力流动加快, 使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

4. 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 难以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在过去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 在降低生育率的同时, 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据估算, 我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 可以提高GDP增长速度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 总抚养比下降了20.1%, 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 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 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 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

但是, 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快将不再上升, 这将长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水平。因此, 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劳动力需求, 将主要依靠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得到满足。如果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继续下去, 一方面将使城市出现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 另一方面又使得农村中上亿的年富力强的劳动者无所事事, 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失去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

四、促进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对策建议

1. 配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些城市户籍制度推进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城市户口本身所具有的“含金量”, 即城市户籍是与就业、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福利相联系的, 城市建设筹资仍然过度依赖再分配机制。城市居民和城市政府担心福利流失, 因而采取排斥外地迁移人口的态度。只有逐步消除这些与户籍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公共服务与福利, 使户籍放开对既得利益者不造成损失, 或使其损失能得到较满意的补偿, 则改革的风险就会很小, 收益会很大, 才能有效减少户籍改革的阻力, 从而减轻改革的震荡。为了保持社会



霍雨佳 / 摄影

的稳定,户籍改革的策略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通过配套改革降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动机。例如,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条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一个减缓震荡的途径。

2.建立涵盖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迄今为止,各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思路,基本上还是以户籍为基础的,主要面向城市居民,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缺乏社会保障使进城的农民工不敢轻易割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难以使他们真正迁移到城市中来。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要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居住生活、失业、医疗、养老等制度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达到进城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制度保障和平等待遇,真正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把进城农民工吸收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实际上是为资金不足的城市保障体系提供了一个筹资渠道。例如,通过把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有利于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即使继续实行目前的养老保障模式,在把农民工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到2020年,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降低16%。

3.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为加快劳动力流动,需要对限制人口流动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要在坚持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在现有集体土地所有制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用法律形式明确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民的承包权、使用权和流转方式,允许农民对土地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对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可依法有偿转让、出租、入股、抵押其土地承包权。此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可以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结合。农民工进城之前,其承包土地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当他们进城后,可以考虑通过土地的流转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使农民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用土地换社保,通过流转、转包等形式将土地移交给别人,并通过土地的转移,筹集一些资金进入社保。

4.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仅仅适应于简单的非熟练劳动需要。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对其就业能力和获得高收入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素质的高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由体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缺乏专业技术技能的局面,必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市民化的进程。近年来出现的“技工荒”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因此,政府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责任,主要在于加强对农民的就业培训,充分利用劳动、就业、教育部门的师资、技

术和设施,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和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此外,要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为农民外出就业提供服务的公共管理网络,加大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提供和发布工作。劳动力市场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企业和个人难以有效提供;同时这些公共服务又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自然失业率,政府应该积极介入,有所作为。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最大化就业的经济增长。要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必须要有充足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1)要充分重视能够有效创造就业机会的非传统经济部门。伴随经济成分的日益多样化,我国的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单位就业的比重逐渐下降,主要由民营经济甚至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单位外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单位外就业已成为我国就业的主渠道。因此,要增加就业,就需要大力发展这些非传统经济部门。(2)从长远来看,需要确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做到在确定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就业政策优先;在产业布局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在企业发展中,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优先;在宏观调控方面,将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 CUR

①世界银行.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2004

②中宣部理论局.理论热点18题.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



蔡 昉

003

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兼职教授,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全球变化的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口科学》主编,教授,博导。1998年获国家级“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2003年3月曾为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讲解《世界就业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出版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经济》等专著。

中国城市化战略与和谐社会构建

章仁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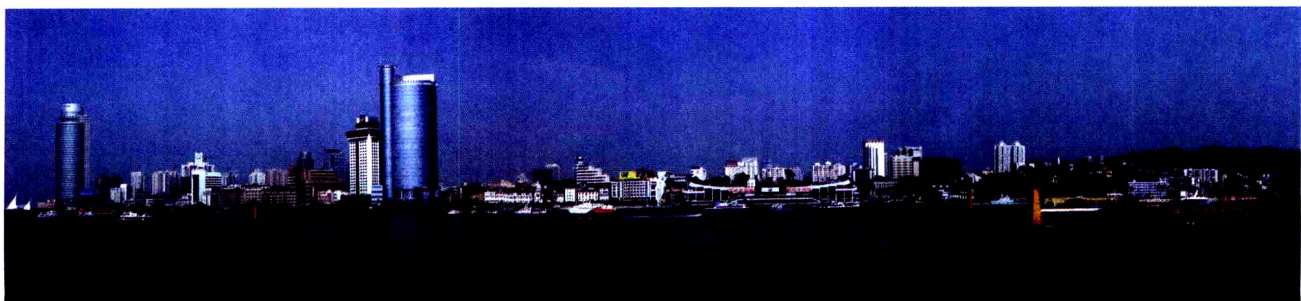
一、引子：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正引起世界的关注

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然而，如何评价这一进程，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我们是应该继续推动这种进程还是应该放慢城市化的步伐？如果说5年前，分歧还是比较小的，争论大多是如何推进实施的问题，但再往前推，城市化却是几乎被冻结的。在城市化长期滞后的背景下，工业化当然受到牵制，尽管出现过用“大跃进”的方式（不管是“土跃进”还是“洋冒进”）来“大干快上”工业化，或用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来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但工业化的任务至今并没有完全完成。自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越过30%，从而进入国际上公认的城市化加速期以来，一方面是城市化的速度引起了一些争议，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化本身的必要性也出现了怀疑。特别是在国外学者对中国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感到惊诧的同时发出的种种质疑，夹杂着对中国快速现代化的步骤可能带来的全球性资源紧张的担忧，这些质疑又与背景复杂的“中国威胁论”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似乎被国内认同的“中国崛起论”——尽管强调的是“和平崛起”——的掺和，还是引起了国际上的一些紧张。所以，今天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我们讨论中国的城市化也不得不分析这样一种国际背景。

诚然，“崛起论”并不等于“威胁论”，后者具有明显的价值臧否，前者似乎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或者只不过是表达一个愿望，一个鼓舞国人信心的口号，但在外人听来总会有些不舒服或者有一种警觉。其实最早的“中国崛起论”是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中国这头“睡狮”一旦醒来就将震惊世界！这可是拿破仑对欧洲的警告，这也是“中国威胁论”最早的“欧洲版”。所以作者以为，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要坚决加以反对是必须的；而对于“中国崛起论”我们也不该贸然接受，有人认为这有利于国内培养爱国主义，

其实不然。当年拿破仑的“睡狮说”传入中国，曾经被转化为“醒狮论”，对于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那是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并不会激起世界的担忧和恐惧，而且也没有多少国际舆论会把中国作为关注的焦点。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话语的传播已经很难有国界线的间隔，国内的任何宣传都将引起世界的注意，特别是中国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包括国外所谓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类的提法，也很难避免不在国际上引起误会，中国不称霸，应该包括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至于世界上有一批人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宣传或期待中国文化能对世界和平多作些贡献，那是他们的权利，我们尽量保持距离。国外有人讲“中国崛起”，我们作一些强调，解释一下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这是需要的，但大可不必的是我们主动去宣传所谓的“和平崛起论”。试想如果我们的邻国或周边国家在喊叫要“崛起”，不论是其国力本来就在你之上还是相对还弱一些，你也会感到一些不安的。笔者想，国际上对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担忧往往是和这些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此外，国内的一些环境主义者及NGO对西部开发中过多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的担忧与责难，也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热浪的反思。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为这种反思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这些年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到了该作出新的判断的时候了。随着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上海正在规划中的“世博会”也提出了“和谐城市”的概念规划。同时，随着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讨论的深化，对这些年来快速城市化的质疑也在深化，甚至有人提出了对上海“世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疑问：“城市，真能让生活更美好吗？”“城市，让谁的生活更美好？”笔者以为，与其简单地封杀此类疑问，不如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来进行讨论更为睿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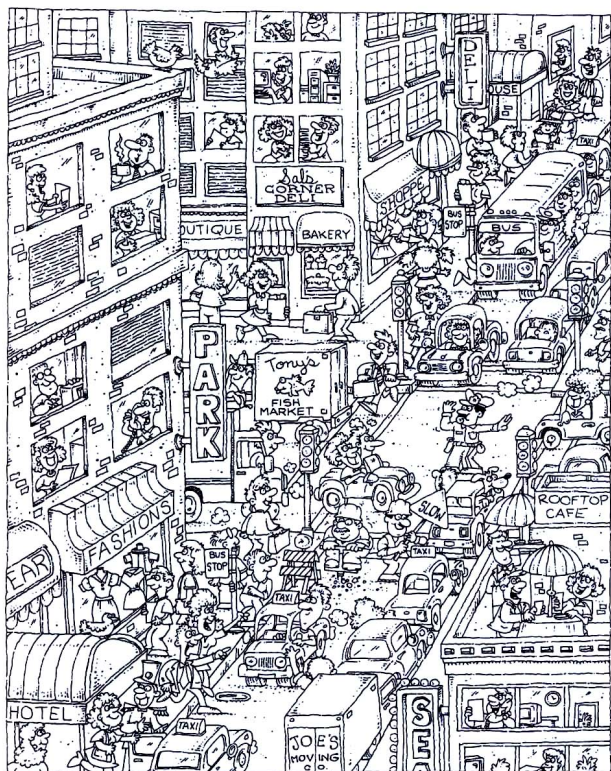
二、从“自在”到“自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世界意义

的确，就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而言，可以称为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是就其规模而言是这样，就其引起之变化的深度而言也是这样。笔者想补充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的自觉性也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巨大的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更。中国的城市化在总体上至今仍然是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本是无可厚非的，总不见得只能你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和文明，而要人家永远保持农业国的地位或成为你旅游所需要的田园诗化和梦中的“香格里拉”。对于起源于19世纪、盛行于20世纪的城市化，笔者曾经有过一个判断，即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城市化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中，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最为巨大的变化，世界的城市化率突破50%，并且出现了17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Mega-city)”，笔者把它们称为“巨无霸城市”。城市规模的一般分类是，人口20万以下被称为小城市，50万以上为大城市，而百万以上则为特大城市。在19世纪初，全世界只有一座特大城市，那就是北京。20世纪初，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而20世纪末，则已经超过了全年的天数：有一个统计认为，到20世末，世界上的特大城市已经有366座，也就是这一年的天数（2000年是闰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镇人口也已经在1998年第一次越过30%达到30.4%——按照国际上城市学界的一般共识，30%是城市化进入加速期的一个关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跨入了快速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的加速无论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世界的城市化都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所引起的世界性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回顾历史，无论是发达国家在19世纪发轫的城市化还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城市化，总体上都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必然出现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处于自发的“自在”状态的城市化。当然这这也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与火”（如最早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圈地运动”被称为是“羊吃人”）以及城市畸形膨胀带来的严重的“城市病”（如拉美的“过度城市化”）。相比于这些被动性大于主动性的城市化经验与教训来说，中国的城市化的自觉性要大得多。不论是20世纪下半叶面对世界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国长期采取的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政策模式，还是这一次主动加速城市化的国家战略，都是明显带有国家意志的印痕。这就难

免会带来不同于完全自然历史过程的城市化的特点，这种主动推进的结果同样可能是利弊并存的。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中国来说，面临的是一个如何既要城市化伴随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又要避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那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羊吃人”现象的重演以及城市化加速中“城市病”的蔓延。平心而论，当城里的学者专家坐而论道或宏图规划时，千万别忘了，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正是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最大的贡献。从50年代的通过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圈地运动”完成新一轮发展的“原始积累”（如80年代以来的种种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和90年代末以来的“大学城”圈地），就是今天被城市赖以骄傲的高楼大厦、通衢大道、宽敞住房、现代绿化，无不都是以农民工为主力的建筑大军的劳作啊，而城里人却常常把种种现代“城市病”的出现归咎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长期保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牺牲农村利益来保护和发展城市的。

因此，今天在讨论城市化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纬度是，必须以城乡利益的“共赢”为目标来规划和调整我们既定的城市化战略。这的确是一个两难选择，就像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在创造出人类史无前例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又要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人性的巨大牺牲的代价。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理论自觉。笔者想，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上，首先要确定两个基本判断：（1）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有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舍此，是无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就是在信息化时代，人类的生存还是需要依赖于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阿童木”【原子】而不是“比特”【信息单位】才能真正满足于人类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当然，可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传统产业，比如建立现代制造业，加速农业的现代化）；（2）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靠直接或变相剥夺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以牺牲城市生活质量的方式实施所谓的快速城市化乃至导致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总之，21世纪的人类的城市化之路，应该是一种基于理性自觉的“自为”的城市化之路，笔者想，中国应该也能够对此作出新的贡献。



三、从“市民数量”到“生活质量”：重新定义城市化

毋庸讳言的是，处于加速中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化，至今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模糊性和实践中的盲目性。首先就是对于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21世纪的而非传统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应该怎样定义我们所想要的城市化？

众所周知，传统的城市化程度主要通过“城市化率”的概念来标示的，而这恰恰是与传统的城市化定义紧密相连的。为了搞清城市化的定义，笔者曾经查过几种词典，也关注了国内学界的表述，其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人口与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集聚和转移的过程的叙述，即是一个基于量的统计的概念，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同时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质的变化过程，一个城市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与辐射的过程。正是后者才使得城市化更具有人类文明进展的积极意义，从而也才能为中国主动推进城市化，乃至于把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找到真正的价值依托。更重要的是，只有把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加以凸现，才能真正为21世纪的城市化校准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城市化不再只有一个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业劳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的目标（其实就是进了城的农民也未必是真正的“市民”——未必具有完整的“市民待遇”），也不再只是一个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运动，除了这些可以直接量化统计的有关城市化水平的量的标志外，还具有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的运动，即实现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传播和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向农村影响辐射转移的目标与过程，即有一个衡量城市化质量的质的规定。所以，作者曾经试着提出过一个新的城市化定义，即所谓城市化应该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和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这样一个两位一体的互动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是一种双向面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城市和农村的互动过程。如果前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是城市化的一种量的表征的话，那么后者（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则恰恰是界定城市化的一种质的规定，无疑，这是一种更具深刻意义的社会变迁。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策源地，无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文明”的拉丁文词干civil正含有公民、市民等聚居的人类的意思）。

“城”，本是人群聚居的地方（但又不同于以农耕为业者聚居的自然村，“城”一般指建有围墙的特定区域，其居民的日常生活不用出此围墙）；“市”，则主要指人们从事产品交换和经济交易的场所。市场经济是当前全球化的主要趋势，但是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明确指出，人们往往错误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经济早就有之。他的研究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市场交易，即所谓的“赶集”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市场形式。这是人们进行农牧和手工产品交换的场所。地点的选择与交通工具的进步息息相关，古老的“集市”一般设置在几个村庄的人们当天能够步行来回的距离内，赶集的人们日聚夜散，迁徙不定。逐渐地有一些人开始住宿下来，专事农产品的收购或手工品的制作，从而成为一个定居点，而这正是“城镇”、尤其是“镇”的由来。而后随着交换的扩大和交通的发展，有车船舟楫所便之处，就发展起了最早的城市。农耕文明亦随着城市的兴起而逐步被城市文明所替代。

但城市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和尺度，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伴随着产业革命后工业文明的迅速崛起，正是人类城市化的形成和同步发展时期。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既是城市化加速度的原因，也是城市化加速度的结果。因为只有城市化的大规模人群聚居和频繁交往，才会有人类智慧的相互碰撞的火花迸发和发明创造的层出不穷，以及现代科技和知识爆炸的“集束效应”。同样，也只有城市生活方式的引领和示范，才能有人类文明的不断扩散和提升。城市化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城镇化”还是“都市化”：中国城市化目标的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何谓中国的城市化？其目标是“城镇化”还是“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究竟该如何计算？笔者认为，“城市化”的概念源于西方，即urbanization，在我国的翻译中有几种，“城市化”、“城镇化”，有时还译为“都市化”（其实，在英语中还有一个“都市化”，即metropolitanization，而相应于“城镇化”也另有一个动词townify，意即“使城镇化，给标上城市的特征”，但基本不用）。那么城市化究竟是“都市化”还是“城镇化”呢？不同的提法带来不同的理解：“都市”在国人的理解中同“城镇”差异迥然。如果将城市化作“都市化”的理解，那么，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比如，就拿城镇人口第一次突破30%的1998年来看，当年全国668个城市市区非农人口总计21867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7.5%！因为如按“都市化”要求看，一般的建制镇（也包括许多县级市）无论如何是称不上“都市”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建制镇的总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几乎增加了10倍，从原来的2000余个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0个！城镇人口的统计数就是包括了这2万多个建制镇的户籍在内的。所以，按我国国情，urbanization被译为“城镇化”，我国的城镇化率到2003年也就已经超过40%；而如果仅仅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来看从业人员比，则中国实际农业从业者早已不到50%，是否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了呢？所以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目标，中国的“城市化”目标既不应该停留在传统讲的“城镇化”目标上，即只是以城镇户口的统计数，也就是只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这一单相面的量的维度为根据；也不应该完全以“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为标准，而只能以现实的国情为依据。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统计方式已经作了一些修改，比如把在城市里有固定居所和工作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与他们的雇员计入了城市人口，这也许就是2000年的城镇人口突然比上一年跃升5个百分点的原因。在此之前，我国的城镇人口增长率一直稳定在年0.5%左右，而后则基本上以年增1%的速度递增（也就是说每年增加一个相当于中等国家人口数的城市人口）。

但是，按照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城市文明的扩散与辐射是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纬度，则中国大量的城镇户口还只是生活在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文明状态中。尤其是传统的城镇户口所意味的吃商品粮资格，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传统的“农转非”的诱惑力也已经大为逊色。于是，“城

镇化率”的数字价值是否只剩下了作为“政绩工程”的一项标志的意义了呢？而就此剥夺农民的口粮田（自留地）和宅基地倒很可能成为其真正的价值所在了。今日的“非转农”也许很可能与当初的“农转非”一样困难了，孰不见，有的城里人不是已经在为了获得宝贵的“宅基地”等农民的土地资源而在那绞尽脑汁获取“农业户口”吗？值得关注的还有进城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他们仍然是“都市里的村民”，远未享受到他们双手垒起的各种城市文明的标志物所象征的城市文明——大量拔地而起的标志性建筑里都流下过民工兄弟辛勤劳作的汗水，但他们能享受得了吗？进了城的农民还是农民，成不了真正的“市民”，得不到城市人的“公民待遇”，这已是快速城市化进展中一道不和谐的风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文明的普及普惠是绝不该被忽视的。

此外，中国国土辽阔，东西发展差距巨大，在实施城市化战略时，也应该因地制宜。基于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经验的“小城镇，大战略”，在西部大开发中未必是可以现场套用的。东部的乡镇企业模式是依托于大城市的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转移的大背景的，未必是西部可以模仿的。且不说东部乡镇企业发展中付出的巨大的环境代价，也将是21世纪的发展所无法接受的，再加上地理条件的限制和人口密度的巨大反差，都将制约西部城市化的战略的实际选择。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的实际发展将既不会是纯粹的“都市化”，也不应是纯粹的“城镇化”，而就是“城市化”；但又可以说是既是“城镇化”（人口集聚的“城镇化”）的，又是“都市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的，是“城镇化”和“都市化”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当然，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城市生活方式的标准也是动态变化着的。当前，以“城镇化”来称呼我国的城市化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城镇化”是否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初级阶段的城市化呢？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城镇化”上，而应该是努力争取实现逐步地由“城镇化”向“都市化”的过渡，舍此，是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时，大都市的人口也会有一个重新向外分散的过程，出现一种“郊区化”的趋向，即人们在选择居住区时更多地愿意从大城市向郊区的小城镇转移，但这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城镇化”，是城市居民自愿选择的由城市向乡镇的转移，是一种高水平基础上的“复归”，而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农民进城式的“城镇化”，笔者相信，到那时，我国的“小城镇、大战略”将更具世界性的深远意义。当然，这也将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由“城镇化”经“都市化”再回归“城镇化”。



008 五、大都市的“郊区化”：“逆城市化”还是“深度城市化”？

毋庸讳言，大都市人口向郊区的分散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也是“后城市化”理论产生的主要背景。这里涉及到所谓的“逆城市化”问题，一些城市学研究者把在发达国家出现的“郊区化”现象，即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出现的大量人口向城郊扩散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乃至“反城市化”，但笔者认为，按照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现象并不能真正称为“逆城市化”，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城市化”，而恰恰是城市化深化的表现，其本身属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城市化进入到“郊区化”的一个新阶段。“郊区”不同于农村，它是个相对概念，相对于城市而为郊区，郊区是附属於城市的，是城市的

延伸和扩散。现代郊区更是成为既能直接接受城市文明辐射，又能享有农村式的自然风光；既能享受高水平的城市生活质量，又能相对避免“城市病”危害的高质量的生活区域。郊区所兼具有的农村风光和城市生活条件，使得其更具吸引力。所以，高度城市化后所出现的“郊区化”并不是由“城市化”向“农村化”、“乡村化”的倒退，而是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享受。“郊区化”不是“逆城市化”，而是城市化高度发展后出现的一种必然阶段，是城市居民的一种主动选择，其实质上仍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应视作城市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超城市化”，或者说是一种“深（度）城市化”。

相比之下，在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的城镇职工回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反城市化”。这是一种城市人口的被动疏散的“农村化”、“乡村化”。特别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穷乡僻壤带去了一些城市文明的信息，但是在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这并不能真正带来城市文明的扩散，而恰恰是把城市居民农民化了。所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文明倒退的口号。而值得研究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大发展中，随着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居民动迁和道路交通的迅速改善，“郊区化”也已初现端倪，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加速期。

此外，“郊区化”的理性选择也将是对“摊大饼”式大都市无限扩张的一种反拨，这就有一个如何保持“郊区”的特质而不至于完全被市区所“同化”或被吞噬的问题。国外曾经在90年代出现过一种叫做“城市扩张限界”的理论，就是要设定城市扩张的边界；但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国“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却很难被制止。北京的环线似乎无法改变“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上海的外环线设置了100米宽的绿化带，但也难挡城市的无限式扩张，“高楼出城”似乎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原外环线周边的一些新建的经济型别墅区不管怎样，总是形成了一个城乡的交接部、过渡区，然而随着地价的升值和房价的攀升，开发商们纷纷转而盖起了多层和高层，这就使得“郊区”完全被“市区”所同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被曲解为消灭“乡村”是否真是城市化的最终宿命？如果把上海今天的城市发展视野从600平方公里扩散到6000平方公里误读为摊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巨无霸”大饼，那也许是城市的灾难！当然，如果最终世界从根本上达到物理形态上的“城乡一体化”、城乡再没有任何差异，这究竟是人类的伟大杰作还是人类的最大败笔？结论还当认真思考。要知道，人类始终是一个追求多样化、异质化而甚于一统化、同质化的存在。